

外国年鉴 编纂出版 概观

李国新
李今山 著
王砚婷

中国旅游出版社

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

李国新 李今山 王砚婷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建华

封面设计:陆本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李国新等著.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8.8

ISBN 7-5032-1546-1

I.外… II.李… III.①年鉴-编辑学-世界②年鉴-出版工作-概况-世界 IV.Z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4921 号

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

李国新 李今山 王砚婷 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9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5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册 定价:16.00元

前 言

本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鉴工作者第一部较系统介绍和研究国外(日、美和欧洲国家)年鉴编纂出版概况的专著。在以下四方面较以往有一定的突破:

1. 日本这一个年鉴大国的年鉴事业发展概况、编纂方法、特点、最新趋势和日本学者关于年鉴理论的看法;2. 关于西方年鉴起源和发展概况,以及关于这一研究的有关问题的辨正;3. 对著名的和市场占有量最多的美国《世界年鉴》现状的介绍和研究;4. 现代高科技的代表、信息产业的主要信息载体——世界 40 多种电子类年鉴的比较研究。

我们相信,本书中众多基本的和新颖的事实,较透彻的论述和有利的论断,以及它所具有的理论深度,不仅有助于读者获得新知识,对今日年鉴在世界最主要的年鉴大国的状况有一个较全面、深层次的了解,还会对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年鉴事业起到推进作用,促使它与市场经济接轨、与世界接轨,有利于各类型精品年鉴的诞生,而且对于中国年鉴学的创立和发展也必将有所助益。

今天,我国公众,包括年鉴编纂工作者对年鉴认识的深度,同 80 年代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今日在社会各界存在着一个广大的年鉴用户层;在出版界或在许多部门、研究所已有上万名年鉴工作者,他们肩负着向社会提供精品年鉴的重任。这些人有必要对西方各国及日本的年鉴事业是怎样的状况,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理论,有一个了解。中外年鉴有共同的方面,也有差别,这是历史、经济和文化不同造成的。我们要编出走向世界的年鉴精品,不在这方面提高认识,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是完不成我们肩负的重任的。

年鉴这种信息载体,是一种综合资料工具书,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数据库。按一般定义,它是对整个社会所有领域或特定领域一年之间发生的要事、新事等信息或数据加以记载或解说,以年刊形式连续出版的工具书,以为用户调查研究和检索信息提供便捷的服务为己任。本来以政府机关名义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称为公报,以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名义出版的称为年报,但由于我国政府机关以往很少出版公报,学术团体也很少出版年报,所以它们近年在创办年鉴时,常常让它身兼公报或年报数任于一身,这种分工不细的情况在今后发展中必将有所改变。由于年鉴是编者或主办单位在客观上有逐年积累或传播本领域信息之需而创办的年度信息载体,所以它的价值并不因与报刊和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并存而稍有减弱。它在我国近 20 年大为兴盛的原因,在于近年以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领域许多学科之间分工愈来愈细,边缘学科、新兴专业层出不穷,在信息量成百倍、千倍增长的背景下,适逢改革开放的盛世,所以客观上各种信息媒体均猛烈增加,因之年鉴种类和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多。在年鉴历史悠久、编纂出版基础较好的几个年鉴大国,年鉴这种便捷的资料工具书,种类更是繁多,如美国 90 年代以来竟有上万种各种大小年鉴出版,市场占有率、普及率也高,甚至与《圣经》一样多地进入千家万户。在电脑等新科技被应用于年鉴出版中以来,编纂方法相应地有了新发展,无纸年鉴也出现于图书音像市场。

我国年鉴编纂出版的热潮始于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的广泛宣传 and 深入贯彻,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提倡和支持,到 1997 年底不足 20 年中已发展到 1400 余种。巨大成绩的取得,在编纂出版实践中可以说已逐步形成了我国年鉴出版事业中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仅举一例:地方综合年鉴约占全部年鉴的三分之二,这一点已成为我国年鉴界一道风景线。80 年代初在中央各部委部门年鉴、大百科年鉴、学科年鉴诞生后,《广州年鉴》、《安徽年鉴》等的创办带动下迅速产生 800 余种地方年鉴,中国年鉴界对这一

特点,尚未做出深入探讨。在我看来,这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特别是人口有 12 亿、全国各省市县政府机构众多,亟需自己的年鉴、公报、年报所致。80 年代以来,大陆省一级行政单位有 4 个直辖市、23 个省、5 个自治区和 124 个地区和地级市;1700 余个县级市县,总共行政单位达 1857 个之多。以目前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 900 个计算,达到 1857 个行政单位的 40% 左右。而中央部委、科研单位、学会、企业等办的仅有 300 余种年鉴,尚不足 15%。这与其他年鉴大国相比,我国地方综合年鉴数量占的比例之大,可以说是一突出特点。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我国科技类年鉴太少,反映了我国科技事业不发达或不重视办科技类年鉴的现实。这构成中国年鉴的另外一个特点。

由于我国年鉴起步以来一直视编纂和经营为年鉴事业发展的两翼,特别是 90 年代后逐渐地扭转了单纯编纂不重经营的片面观点,所以近年在经营方面有了较大起色,总的说来,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体平衡。这一点与这些年领导层紧抓年鉴经验交流工作,坚持年鉴学术研究分不开。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十多年来学术研究工作的推动起了显著作用。如从 1990 年开始召开过 6 届全国性学术年会;在年鉴研究会所办的期刊《年鉴信息与研究》等和各次学术会议上,共发表论文 1000 余篇;在每四年召开一次的两届优秀年鉴论著评奖会上,评出 100 余篇优秀论文,10 部优秀著作。从 1989 年至 1997 年底我国出版的有关中国年鉴学和编纂出版经验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已达 14 部之多。这种年鉴著作出版热潮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我国年鉴界的另一道风景线。

然而,从上述研究工作和论著的发表中可以发现一个美中不足:对国外年鉴的介绍与研究十分匮乏,在 1000 余篇文章中仅有几十篇涉及国外年鉴的评介,在 14 部著作中没有一部外国年鉴研究专著,仅在几部著作中有个别篇章对国外年鉴做过研讨。

中国年鉴界所以对国外年鉴的研究较为薄弱,论著缺少,甚至有每况愈下之势,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发展看,80 年代初对

这方面工作还是注意的,甚至可以说,对学习和借鉴外国年鉴特别是英、美、日三大年鉴国家还是重视的,不仅在 1984 年年鉴研究会创立时就注意抓外国年鉴研究和论文发表,在《年鉴通讯》中也注意刊发这类文章,数量虽不算多,内容尽管尚简略,但读者对它们颇感兴趣。由于这些文章蕴藉着西方年鉴的知识和文化,论断新颖,读者很开眼界,得到不少启示。当一些国外年鉴动态,有关素享盛名的、发行量多的如美国《世界年鉴》、英国武器报道权威的《简氏年鉴》、日本第一大综合年鉴《朝日年鉴》等有关的介绍文章发表时,引起年鉴界同仁的注目。我们的确从中学习到不少东西,如从它们那里了解到国外这些年鉴精品的风格、特点,从他们的编纂方法,条目编写中得到启发。

经过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年鉴界同仁现在已深深认识到,中国年鉴界取得今日的成就,是与平素学习和研究年鉴理论,包括借鉴世界各国年鉴的经验结为一体的。因此,要持续推动中国年鉴事业前进,在变轨转型中取得新的成绩,迎接 21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大发展,还必须坚持和进一步加强年鉴理论研究,包括对国外年鉴界的密切关注,特别是要关注美、日几个年鉴大国的最新动态和新鲜的编纂经验。我国年鉴界在提高和推动中国年鉴事业发展中,应把介绍和研究国外年鉴的经验和理论,列为自己一个长期的基本任务。关于这一点,的确在许多同仁中间有了共识。他们对有内容的写得好的有关国外年鉴的研究论文,至今印象深刻,常常提及。

1996 年秋在济南市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年鉴学术年会暨第二届年鉴论著颁奖会上,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李国新做了题为《日本年鉴界几个理论问题》的重点发言后,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其实,把某一年鉴大国年鉴发展史作为一个大的参照系,同本国年鉴的发展作比较、加以揣摩,这对我们改进本国年鉴,发展中国年鉴事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对正在创立中国年鉴学这一艰巨的任务说来,更是不可或缺的。不结合各国年鉴经

验做比较研究,凭什么说某些特点是中国特色呢!

有些同仁反映,这几年有关国外年鉴的介绍和研究热度降低了,有深度的理论文章发表得少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有所忽视。近年在国内查阅有关外国年鉴的资料本来比 80 年代更方便些了,可是研究介绍工作却开展得少了;第二,我国年鉴事业已发展壮大,也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模式,但似乎对吸收外国年鉴的经验已不那么强烈关注了。这样就无可讳言地存在诸如“我们是专业年鉴或地方综合年鉴,而见到的有关国外年鉴介绍和研究文章,常常与我们不对口……”,这种种说法,事实上就把介绍和研究国外年鉴的理论文章单纯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方,要求它解决任何年鉴本身的具体问题。这虽是少数人的看法,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它的片面性。

我们幸逢改革开放的盛世,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对年鉴界大有促进。1996 年夏秋之交,李国新副教授(兼中国年鉴研究会研究员)受北大信息管理系派遣去日本早稻田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行一年的学术交流。在这一期间,他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兼对日本年鉴的现状和理论进行研究;1996 年底,广东年鉴社副社长丁小伦随同省信息中心访问美国,利用这一时机她访问了美国《世界年鉴》编辑部,并对该年鉴进行调查研究。此时,我正和《中国电子工业年鉴》前编辑部主任黄史坚、北京图书馆研究参考部工具书室负责人王砚婷策划出版《外国年鉴编纂出版概观》一书。李、丁两位的研究成果。充实了本书内容,使它更富新意。尽管如此,由于本书著者掌握的资料和学识所限,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李今山

1998 年 8 月 5 日

目 录

前言	I
第一编 日本年鉴编纂出版研究	
第一章 日本的“年鉴”与“年鉴类”	2
第一节 年鉴	2
第二节 年鉴类	3
第三节 年鉴的出版物属性:连续出版物	6
第二章 日本年鉴的数量与类型	7
第一节 日本出版年鉴的总数	7
第二节 日本年鉴的类型划分	14
第三章 日本年鉴的起源与发展	15
第一节 日本年鉴的起源	15
第二节 日本年鉴的发展	16
第三节 制约年鉴发展的两大社会性因素 ——经济发展状况与资料需求的时代性	27
第四章 日本年鉴的传播与普及	30
第一节 以中小学为突破口的“年鉴教科书化”战略	30
第二节 由“教科书化年鉴”向“作为读物的年鉴”的 转变	33
第三节 余论	34
第五章 日本年鉴的内容与特点	36
第一节 日本年鉴的学科分布——宏观结构体系	36
第二节 日本年鉴的两大特点——“记录性”与“资料 性”	40
第三节 日本的百科全书年鉴	45
第四节 日本的“杂志型年鉴”	51

第五节 日本的“综合数据库型年鉴”	54
第六章 日本年鉴的编纂与出版	61
第一节 关于年鉴编者	61
第二节 关于收录时限与出版时间	63
第三节 关于装帧与版面	65
第四节 关于年鉴的编译与影印	68
第七章 日本年鉴的研究与评论	70
第一节 研究概况	70
第二节 日本学者提出的“年鉴选择评价标准”	73
第二编 日本近现代年鉴出版概况	
第八章 日本近现代年鉴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76
第一节 日本年鉴出版总量	76
第二节 日本年鉴名称的界定	79
第三节 日本年鉴出版特征	79
第四节 日本年鉴的设计	80
第九章 当代日本年鉴界的动向——同《朝日年鉴》主编野泽敬 的对话	81
第十章 三种日本年鉴评介	88
第一节 《少年朝日年鉴》的创意和“杂志式”编纂特色 ..	88
第二节 日本《图书馆年鉴》印象	95
第三节 《日本福利年鉴》的特色	99
第三编 西方年鉴发展史研究	
第十一章 西方年鉴的起源和发展	106
第一节 西方对年鉴的传统认识	106
第二节 西方年鉴起源和发展问题的辨正	107
第三节 年鉴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111
第四节 西方年鉴发展史给我们的启示	119
第十二章 西方年鉴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122
第一节 法国年鉴学派不是年鉴界的理论学派	122

第二节 马克思“主编过年鉴”吗·····	123
第四编 国外年鉴评介与比较研究	
第十三章 美国《世界年鉴》的沿革与现状·····	128
第一节 《世界年鉴》出版概况·····	128
第二节 《世界年鉴》的内容、结构及其特点 ·····	130
第三节 《世界年鉴》的写作特点·····	137
第四节 对改进中国综合性年鉴编辑内容与写作方式的 建议·····	140
第十四章 中外电子年鉴比较研究·····	143
第一节 当代世界电子类年鉴发展概观·····	143
第二节 世界电子产业类年鉴及其比较分析·····	148
第三节 世界军事电子装备类年鉴·····	160
第四节 《中国电子工业年鉴》及其分析·····	163
第十五章 东亚地区出版类年鉴比较研究·····	167
第一节 框架比较·····	167
第二节 内容比较·····	169
第三节 检索系统比较·····	172
附录 80年代以来国外年鉴介绍研究论著索引 ·····	174
后记·····	178

第一编

日本年鉴编纂出版研究

第一章 日本的“年鉴”与“年鉴类”

日本学者谈到年鉴,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是“年鉴”和“年鉴类”。从理论上说,这两个概念有联系,也有区别,但日本学者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似乎统而言之者居多,未作严格的辨析与界定。然而对于了解与研究日本年鉴的中国同仁来说,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必须首先加以辨明的。

第一节 年鉴

什么是日本学者所理解的年鉴?以下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年鉴是按照某一特定的地域或分野,以最新的事件、动向和统计资料等为内容,每年或每间隔一二年刊行的出版物。”(《日本大百科全书》)“年鉴是记录全社会或特定领域一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并加以解说的年刊形式的‘便览’,目的是为以后的调查研究提供方便。”(日本平凡社《大百科事典》)“年鉴是以一年间的概况为中心,用统计、图表等加以解说的每年刊行的连续出版物。”(长泽雅男:《情报和文献的探索》第2版)

上述一类说法,属于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界定。在这一层面上,应该说日本学者对年鉴的理解、认识与中国学者基本相同,也与国际惯例相同。笔者以为,上述说法中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年鉴这种出版物属性的定位:每年刊行的“连续出版物”。这一属性是年鉴所以区别于其它资料性工具书的重要标志,年鉴的其它属性多与此相联系。

第二节 年鉴类

在日本,和年鉴这一概念同时被使用的,还有“年鉴类”这一概念。什么是年鉴类?最早的明确界定,见于1963年清和堂书店编辑、发行的《战后日本年鉴类总目录》一书《前言》的说法:“逐年或在一年以上的一定期间内以同一书名刊行的出版物,以及不论定期或不定期,以‘年鉴’、‘年报’及类似文字作为书名一部分的出版物。但是,电话簿、预算书、考试问题集和具有此类性质的儿童图书除外。”1964年10月,此书出版改定增补本,书名改为《日本年鉴类总目录》。它的新《前言》除沿袭上述关于年鉴类的说法外,对“除外”部分又有新的补充:“一部分未以‘年鉴’、‘年报’字样作为书名的学术杂志、学术论文集除外。”这一补充的重要性,在于划清了年鉴类与期刊杂志的界限。

从上述定义看,日本学者所说的年鉴类包含两大要素:一是以同一书名连续刊行;二是书名中明确标有“年鉴”、“年报”一类字样。至于刊期是否以年为单位,定期出版还是不定期出版,这些都无关紧要。这样一来,即便是不再考虑那些按惯例予以“除外”的部分,所谓“年鉴类”涵盖的范围也比年鉴宽泛多了。

综合分析日本一些年鉴类目录的收录情况,并参照某些著述中的论述及图书情报部门的工作实际,日本学者所说的年鉴类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出版物:(1)书名中明确使用了“年鉴”、“年报”、“年刊”一类文字的出版物。严格意义上的年鉴,就包括在此类出版物之中。(2)具有连续出版特点的各类白皮书、蓝皮书、统计集、调查报告集、工作报告集、市县形势要览等。(3)具有“改定版”性质的便览性、指南性资料,如各类名簿、资料集等。日本学者称此类出版物为“轮回式出版物”。(4)装帧与“图书”完全相同的年刊出版物。

日本学者之所以把上述种种出版物统称为年鉴类,是因为他

们认为这些出版物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特点与功能。《年鉴·白皮书全情报》一书在《出版前言》中写道：“同样采用连续出版物形式的白皮书、年报、各种调查报告集等，与年鉴相比，‘一次性资料’的性质非常明显，但作为情报源，又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这里所说的“非常相似的特征”，恐怕并不是指编排体例、表现方法、结构与工艺一类东西，而是指它们作为参考工具书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功能与效用。也就是说，日本学者主要是从功能、效用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年鉴，由此便把年鉴和与其功能、效用相近的参考工具书集中在一起，这种做法就形成“年鉴类”这一概括。中国学者不仅从功能、效用的角度出发，而且还特别强调年鉴的编辑体例、表现方法，亦即年鉴编纂的规范化，从而使年鉴与其它相近类型的参考工具书有相对明确的区别。出发点、侧重点的不同，导致了对同一客体认识的差异。

按照日本学者的理解，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给年鉴和年鉴类的语义范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因此，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找不到这方面的论述。相反，把年鉴和年鉴类几乎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如平凡社《大百科事典》的“年鉴”条目，在开宗明义对年鉴的定性描述后，马上补充了这样一句：“在政府机关或学会，也有称为‘年报’的。”显然，作者认为“年鉴”和“年报”是一回事，不过在名称上略有区别而已。日本著名的参考工具书专家、前东京大学教授长泽雅男在谈到专门主题年鉴时说：“专门主题年鉴，……不仅主题多种多样，而且名称也五花八门。当然有使用‘年鉴’这一名词的，而冠以‘年报’或‘要览’一类名词的也为数不少。在政府机构以白皮书形式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具有专门主题年鉴性质的也占多数。”他在谈到地域年鉴时又说：“在我国，由地方公共团体每年编辑发行的市势要览、县势要览等出版物，也可以看作是地域年鉴的一种。”在长泽先生看来，叫年鉴也好，叫年报、要览、白皮书也好，只不过是“书名五花八门”的表现而已，并不妨碍它们都属于年鉴——事实上是都属于年鉴类。上述一类看法，

在日本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对年鉴的日本式理解,决定了在日本“年鉴类”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认知程度远比“年鉴”高。如《日本目录规则》在说明“连续出版物”所包括的出版物种类时,列出了“年鉴类”,而没有单独列举“年鉴”;日本的图书馆在处理文献时,一般也是把“年鉴类”作为一个类别对待;60年代以来,日本编制了多种有关年鉴的目录,绝大多数也是“年鉴类”的目录。就是在一般日本学者的心目中,年鉴类也是一个包括年鉴在内的更为常用的指称方法。如笔者曾多次和日本学者谈及年鉴问题,多次在日本的图书馆咨询年鉴问题,而对方言及的,往往是年鉴类。

1993年,王相钦、周斌发表的一篇题为《年鉴的中国式理解及其流派发展》的文章,谈到当年鉴这种外来的文化载体形式进入到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后,“虽然它的名字还是叫‘年鉴’,但其内涵的文化、社会等因素,就已经整体地或部分地,明显地或不明显地,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生了嬗变。”笔者认为,这一道理具有普遍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年鉴都是舶来品,但时至今日,两国对年鉴最基本的认识与理解却有明显的差异,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思维认知方式的不完全相同,这原本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当我们中国人去了解日本年鉴的时候,面对这些差异,首先便需要对种种相同之处、不同之点有清楚而准确的了解,否则,对话或比较便失去了基准。如国内现有的某些论著,往往把日本学者所说的“年鉴类”图书等同于中国意义上的年鉴,那么,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比较研究就难免不够科学和准确。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准确了解日本“年鉴”与“年鉴类”的指称范围,绝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概念问题,而是一个以中国式的年鉴观念去观察日本年鉴时必须首先廓清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理论问题。

第三节 年鉴的出版物属性:连续出版物

年鉴是一种具有什么属性的出版物?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视同于一般图书到强调其“连续出版物”属性的变化。

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年鉴在日本基本上被视同为普通图书。这一事实的具体表现是,从年鉴的编辑者来看,并没有特别强调年鉴“逐年编辑,连续出版”的特性;从典藏、利用年鉴的主要部门之一——图书馆的情况来看,也没有把年鉴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出版物来处理。在多数图书馆,年鉴的目录卡片与普通图书混排,使用者检索年鉴,也只能从馆藏图书目录入手。这种做法,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年鉴的认识。

在日本,重新审视年鉴这种出版物的属性,是先从图书馆界开始的。在50-60年代,当日本年鉴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加以后,图书馆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感到把原本具有“连续出版”特点的年鉴作为普通图书来处理,给整理与利用带来的不便。在1965年版的《日本目录规则》中,年鉴被明确地归入“连续出版物”。

什么是“连续出版物”呢?上述《日本目录规则》的解释是:“在无限期连续出版的意图下,作为原则,以一定间隔顺次出版的刊行物。”该规则“新版预备版”的解释是:“没有终刊期的预定,定期或不定期地连续出版,使用同一名称,按标示的卷号、年月顺序顺次出版的刊行物。”

连续出版物包括哪些种类?《日本目录规则》的规定是:“杂志、报纸、年报、年鉴类、学会纪要、议事录和会报等。另外,也包括学会等机构逐次出版的有关一定主题的丛书,以及由出版社发售的丛书。”虽说规定是这样,但在图书馆的实际操作和一般人的心目中,像丛书这种仅仅具有“出版形态”上连续刊行特点的出版物,通常又被从连续出版物中剔除了出去。